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从“地下”窥探启蒙运动

上帝的小提琴

构筑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

即使只有一个政治犯，
也实在太多

—— 昂山素季在诺贝尔颁奖
典礼上的获奖演说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夏佑至 扬克 孙骁骥 灵子

轮值编辑

夏佑至

观察员

文学: 朱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刘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克(德国·图宾根)
灵子(北京) 燕舞(北京)
吴强(北京) 言一(成都)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2012年9月 第6卷第7期

总第58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 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 对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曾经的异议人士正成为政治和解的象征。2012年亚洲最重要的政治变化出现在中国的邻邦缅甸。被软禁多年的昂山素季重获自由，并通过4月的议会补选，当选为缅甸国会议员。6月，昂山素季作为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挪威奥斯陆发表了迟到的获奖演说，演说全文无疑将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昂山素季在演说中表达了明晰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可从多个面向加以解读。政治家、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城市中产阶级、底层民众和佛教徒，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各自的认同，这不但表现了昂山素季本人的信仰、眼界和胸怀，也展示了良好政治必定具备的人性根基和包容性。

2012年亚洲政治的另一个变化出现在中日之间。在中日恢复邦交40年之际，钓鱼岛问题在中国各地引发了规模不一的反日游行，余波甚至波及美国驻华大使的座驾。值得关注的是游行者诉求多样，已经超出了中日关系的框架，其间发生了多起令人不安的针对暴力事件。美国、日本、中国乃是世界上经济产值前三位的大国，一旦钓鱼岛问题持续发酵，并成为相关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选项，实非各国民众之福。本期刊出刘柠专文，旨在从民间和底层视角出发，寻求中日关系的新出路。此文日文版亦将在日本《外交》杂志刊出。



目录

封面用图

Over the Town
Marc Chagall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经济 • 苏小和
杂志 • 罗四鸽
文学 • 戴新伟
思想 • 成庆
文史 • 王晓渔

005-020

书评

• 凌越
从“地下”窥探启蒙运动

050-063

音乐

• 马慧元
上帝的小提琴

050-063

写作

• 刘柠
构筑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

050-063

译介

• 周迪灏
“即使只有一个政治犯，
也实在太多”
—— 昂山素季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
获奖演说

064-075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最近读书，依然是新旧杂陈，且以旧书为主。

先说新书。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较量：通向自由之争》（东方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布鲁克斯的一本小册子，据说在美国销量极好，在年度单位时间之内，一度超过了哈耶克的影响力。事实上，理解这本书非常简单，第一，要在国家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的选项中做出选择，阿瑟当然认为，所谓美国精神，在市场经济的意义上，就是没有的自由企业制度。第二，这是一本专门批评现任总统奥巴马的小册子，不过很有意思，阿瑟并不是站在党派之争上进行批评的，而是站在自由企业制度的基础上，站在美国最近几年经济史的基础上，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自由理念。

为此，阿瑟把美国的民意细分成两部分，30%的国家主义，70%的自由企业制度。但遗憾的是，正是30%的民意主宰着当下的美国经济政策，毫无疑问，最大的主宰者，是奥巴马。

由此，阿瑟的批评沿着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社会主义者、或者是国家主义者主张收入再分配的少数派（30%）与倡导自由企业、工作伦理和机会导向的多数派（70%）这两种人之间，正在展开一个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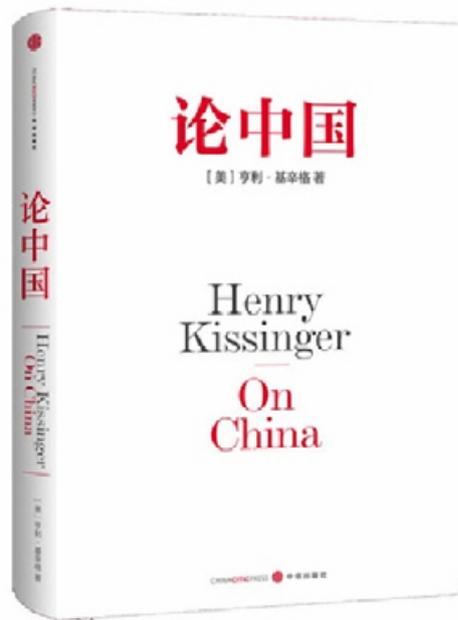
于美国的未来的基本争论。其次，有一个掌权的精英体系，能够使30%的少数派统治70%的大多数人。第三，这是一个价值观层面上的冲突，那些赞成财富再分配论的人和那些左派的追求物质享受的人已经盗用了道德的表达方式，而那些支持自由主义、赞成追求个人机会和幸福的人在公众辩论中又被放到一些平庸的、毫无吸引力的位置上。阿瑟所勾画的一个由道德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光辉使那些拜金主义者、中央集权论者、主张强制性的财富再分配论者都黯然失色。

由此，有读者认为，阿瑟的这本小册子之于这一代美国人的意义，就像哈耶克的

《通往奴役之路》对于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意义一样重要。

夸张么，你读了以后，就大概知道了。不过需要交代一句，现在的中文翻译比较坑爹，这本书的个别段落，也不例外，有些段落我怀疑是直接用google在线翻译的，比如第21页的第二段，连句子都不通顺，相信翻译者不会如此文笔不顺，只是翻译速度太快了一些。

其次说《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大名鼎鼎的基辛格的著作。从企鹅版翻译而来，大致忠实于原作，不过有些章节，比如1989年前后，基辛格的叙述语焉不详，有些地方一笔带过，相信这不是基辛格本人的意思，而是中国和谐社会的力量。我愿意阅读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在我看来，基本呈现了基辛格这个人的价值观导向和利益导向。由此人们或许能看到，美国人这些年一方面不会放弃自己的国家理念，比如人权与自由，一方面又希望能从与中国的合作中，找到利益。一些时候，这样的外交格局是摇摆的，有时候有些迎合，有时候有些妥协，有时候又有一些坚定，但大致方向不会变。这种看上去八面玲珑的外交姿态，让中国的一些官僚以为，基辛格这样的人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是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但把这本书读完了，我却能苦涩的看到，其实基辛格看不起中国人的僵化和封闭，看不起这个古老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缓慢与陈旧。只是，



作为外交官，基辛格可能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人。

接下来说说我读的旧书。把《中国银行业发展史》（张郁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白吉尔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和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1962年初版；2012年1月人民出版社以三卷本的形式再版）放在一起阅读，目的是想搞清楚民国初年钱庄的基本格局。钱庄，今天叫做地下钱庄，属于破坏社会主义金融秩序的犯罪集团，吴英为此正在死缓刑期。

受过一点点市场经济理论训练的人都会知道，当进出口贸易自由流动，当生产和

交换呈现出显著发展的态势，当企业和企业家的利润明显增长，其发展的内在理由，一定是受到了自由金融信贷的有力支持。一个基本的市场事实是，自从晚清通商口岸时代来临，中国大部分商业银行，都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民间钱庄的发展，一直处在外国银行和晚清政府管制的双重挤压之中。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外国银行纷纷缩减规模，甚至撤离中国市场，而晚清政府垮塌，新的大政府主义尚未建立起来，这种局面为真正中国民族的自由金融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1912年到1920年，非政府性的商业银行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1912年整个银行的资本金为36亿元，到1920年则达到了52亿元。仅仅在1918年到1919年，国内由民间新创办的商业银行，就达到96家，虽然有一部分银行依然和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存储国家的资金与借款。更多的民间商业银行主要致力于真正的自由信贷竞争，从而催生出民国时代真正的市场金融秩序。

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就是著名的上海银行，1915年由张謇创立，合伙人中有为数不少的知名企业家。当初的银行自有资本金不过10万元，但到了1919年，银行资本金已经达到100万元，存款规模更是达到500万元。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也是创办于1915年，它的前身是纯粹民间商业性质的浙江省银行，如果恰逢市场活跃期，发

展也是蔚为大观。中国银行倒是一直受制于政府关系，但他们在杭州的分行，却在这个时候主动放弃了有关国家资金的存储业务，改由真正的市场化竞争。盐业银行同样起步于1915年，四明银行也是在这一年开张，而1916年天津的中孚银行也参与到了市场的运营之中。至于老牌的浙江兴业银行，起步最早，开始于1906年，一直受到洋行的挤压，1915年金融市场越来越活跃，从杭州迁址于上海，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在华中地区和华北各省设立了十几家分行，银行的存款规模因此迅速攀升。1913年，他们的存款规模不过260万元，而1918年，就达到了1000万元，已经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真正的市场化商业银行，对经济的拉动是直接有效的。一方面，这些民办的银行具有敏感的市场一线信息，他们在不断做大存款规模的同时，参与到了切实有效的企业投资之中，而且这样的投资事实上是当时当地惟一可以大面积实施的投融资方式。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结构发展到民国初年，并不具有投融资的丰富性，比如国外已经非常成熟的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在中国尚未开始。通商口岸的租界之内，的确有一家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机构，但这里仅仅只开设外国证券的交易项目。当国内的民间商业银行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必定会催生出证券业的发展。1920年就是一个值得中国证券行

业纪念的时间。这一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这是民国接下来一段时间大量的类似的交易所普遍开展起来的先声。仅仅一年之后，上海产生出140个交易所，规模和从业人员可谓浪潮滚滚。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市场化的商业银行的大面积发展，他们和传统钱庄之间的竞争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关于民国初期的钱庄，至今仍然是一个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优美话题，人们怀念那个年代金融的市场化和民间化，怀念中国人的金融智慧，以及散布在人们心头的诚信商业精神。事实的确是这样的，新兴的市场化商业银行开始主动向传统的钱庄学习，对民间进行直接的借贷，而传统钱庄则向商业银行学习，如何通过市场化和规模化的发展，吸引到更加庞大的存款规模。和钱庄相比，商业银行在借贷方面的顾虑要多很多，如此他们建立了严格的担保制度，通过不动产或者商品库存作抵押的方式，来降低风险，确保其信贷资金的安全性。而钱庄的发展长期以来只是局限在熟人社会之中，并没有将其经营的边界扩大到整个市场范围之中去，这直接导致了钱庄虽然历经数年，但发展速度远远不如新兴商业银行的局面。

现在，双方的真正的市场化竞争开始了。结果是非常有趣味的。钱庄的市场竞争力似乎好于商业银行，这是很多国外的金融史学家难以理解的市场现象。虽然商业银行存款规模巨大，但真正被企业和企业

家欢迎的，依然是钱庄。有人解释，这其中一定有钱庄的投机活动，但企业的逻辑，事实上就是要在市场里发现投资的机会，这正好说明了钱庄的市场优势。1920年的上海，钱庄发展到71家，总共控制着770万元的资金规模。钱庄的数量的增长率是130%，资金增长500%。

有人研究了钱庄资本的几个不同的来源。其一是众所周知的买办的投资。晚清时代，以及接下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国向来富有的买办阶层，通常都是将他们的资金存入外国银行，大战开始之后，为了确保资金的安全性，他们普遍将资金转入到了国内的钱庄之中。其次是一部分高利贷者、鸦片商人和染料商人的资金也流入到钱庄之中。纺织印染行业一直是民国初年的主要手工业之一，他们一方面受益于整个棉纺织业的发展，一方面学习了外国进口化学印染的技术，同时在早期，民间钱庄也在金融的层面有力支持过这样的行业。他们的人数非常庞大，经济活动稳定，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确定性，口碑很好，因此，他们从过去的钱庄的客户，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钱庄的股东，就是理所当然的市场行为。

相关的案例，是很生动的。比如上海的信裕钱庄，1915年开办，其资本主要由当时的三个鸦片经营商提供，资本金为6万两，钱庄的主要经营事务，不是由中国人自己操持，而是花重金请来了外国银行的买办来

打理。这意味着，第一，这家钱庄的资金来源并不光彩。当年的鸦片上如今变成了钱庄老板，当时当地资本的快速流动，由此可见一斑。第二，老板们本身并没有从事金融信贷的经验，买办的管理优势从外国银行转移到了如今的民间钱庄之中，这是金融经验和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和职业化。

还比如宁波的恒兴钱庄，1905年在宁波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之前，大概有资本金3万两，1912年到了10万两，1933年达到14万两。存款规模也是与日俱进，1913年不过58万两，1919年就增加到80万两。相应的，贷款的力度同样在加大，1913年放出的贷款为41万两，1919年增加到93万两。此外，他们还有着灵活的短期贷款措施，主要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

如何解释民间的钱庄竟然可以抗衡正规的商业银行，甚至略有胜筹，一个比较合理的分析是，钱庄不像正规的商业银行那样，对贷款流程的担保人制度要求严格，事实上钱庄基本不要求担保，而主要依靠信用借贷制度。这种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形成了一个经营链：信用借款的受益人，通常是商人和企业家，而他们在获取一定利润之后，又将资金存入钱庄。如此，企业可以及时拿到投资，而钱庄则可以及时吸收存款。双方形成一种市场交换层面的联合，得以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其中的受益者可谓如数家珍，无论是生丝的国际性交易，还是棉纺织业如大生纱厂的国内生

产，钱庄都为他们持续提供着丰富的资金支持，这使得古老的钱庄不仅在传统领域具有金融的影响力，而且对现代性的工商企业也构成了真正的杠杆性作用。

缺陷当然是有的，一些时候甚至发展成为巨大的风险。最明显的问题在于，一些钱庄与客户之间的私人关系，虽然确保了双方对资金的需求渠道，但无疑又限制了市场的范围与金融手段的多样性。事实正是这样，民国的钱庄基本上属于一种地方性、区域性的小型金融机构，始终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多网点、能够协调一致性地直面更加开阔的市场的金融架构。所谓金融市场里的小舢板，指的是钱庄由于规模过小，过于依赖地方市场，导致它不可能具有良好的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尤其是不具备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1916年10月、1917年5月、1918年10月、1919年11月，上海金融市场在这四个时段，都发生过明显的通货紧缩风潮，很多钱庄遭遇冲击，甚至关张，就在合理的逻辑之中。

不过总体来看，民国初年尤其是黄金时代大约20年之内，金融的自由秩序是非常明显的，真正的市场化商业银行大面积崛起，传统的钱庄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市场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享有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权利和地位。那是一种金融多样性发展的时代，给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价值。1919年到1929年，国内的棉纺织业企业的利润逐渐增加。股票持有人也

跟着财源滚滚，其股票红利达到40%，极个别股票达到90%。与之相应，钱庄的利润率当然也是年年看涨，平均利润增长率竟然达到80%。

这真是一个满世界都弥漫着资本气息的黄金时代，太多的人们夹着那个时代的公文包，穿行在广州或者上海，宁波或者天津的街道上，似乎财富唾手可得。这样的市场风景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伟大的命题，那就是市场的自由和金融的自由。由此想到多年之后，中国的金融秩序几乎由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外资银行只是一道市场竞争的小小点缀，而大量的钱庄被政府界定为非法机构，受到一轮又一轮的打压，有的人为此身陷囹圄，有的人甚至死于非命，市场的风景，真是恍若隔世。❶



特约观察员 罗四鸽 (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美国接连两位作家陷入“丑闻”了。8月10日，《时代》杂志专栏作家和CNN电视主持人，美国最受欢迎的印度裔作家法里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承认并道歉，其日前发表在《时代》杂志上一篇有关枪支控制的文章抄袭了《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扎卡瑞亚在其发表的申明中说，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完全是我一个人的错误。”在另一份申明中，《时代》杂志发言人阿里·泽兰蔻(Ali Zelenko)说，《时代》杂志接受扎卡瑞亚

的道歉，但将暂停扎卡瑞亚的专栏一个月，“有待进一步审查”。“他所做的违反了我们对于专栏作家的要求：专栏作家的文章必须符合事实，且必须是原创的；不仅他们的观点必须是他们原创，他们的用词也必须是他们原创的。”随后不久，CNN也宣布，撤销了他在CNN网站上贴的这篇文章的博客。在审查期间，他们也将暂停扎卡瑞亚在CNN的时评类节目《法里德·扎卡瑞亚的环球公共广场》。

扎卡瑞亚的涉嫌抄袭的专栏文章The Case for Gun Control中的部分段落与



图为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Fareed Zakaria。他曾经为TIME杂志访问中国总理温家宝，并撰写了封面文章。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吉尔·莱波雷 (Jill Lepore) 四月发表于《纽约客》的一篇文章《美国战场》(Battleground America) 非常相似。扎卡瑞亚有一段开头为:

Adam Winkler, a professor of constitutional law at UCLA, documents the actual history in 'Gunfight: The Battle Over the Right to Bear Arms in America.' Guns were regulated in the U.S. from the earliest years of the Republic.

而莱波雷的文章开头为:

As Adam Winkler, a constitutional-law scholar at U.C.L.A., demonstrates in a remarkably nuanced new book, 'Gunfight: The Battle Over the Right to Bear Arms in America', firearms have been regul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st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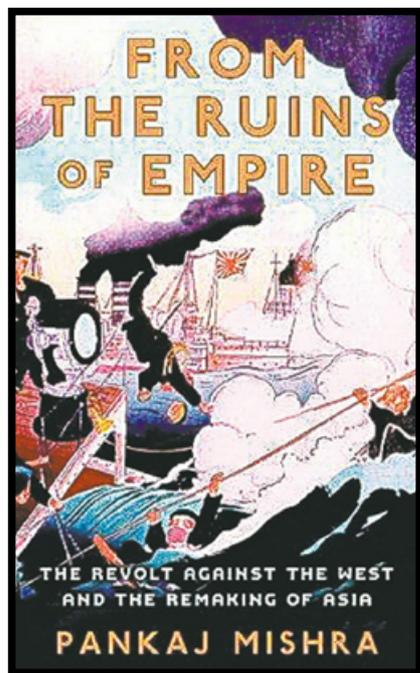
这两篇文章之间的相似性首先被一个保守的网站NewsBusters发现, 然后出现在一个媒体人的博客上, 之后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当天下午, 扎卡瑞亚便发表声明承认抄袭, 并向莱波雷, 还有他的编辑和读者们表示“诚挚地”道歉。

扎卡瑞亚1964年出生于印度孟买一个穆斯林贵族家庭, 在耶鲁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 并为《耶鲁政治月刊》主编。1993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2年为《外交》杂志主编, 2010年10月, 为《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2010年8月成为《时代》周刊的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

就在扎卡瑞亚抄袭事件的前不久, 美另一位著名作家也犯下职业道德错误。一位名叫迈克尔·莫伊尼汉研究者在Tablet杂志发表文章质疑生于1981年的科学作家乔纳·莱特 (Jonah Richard Lehrer) 在他的畅销书《**想象: 创造力是如何运作的**》(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 中杜撰了著名歌手鲍勃·迪伦的引语。随后, 7月30日, 莱特在申明中承认: “被质疑的引语既有确实不存在, 有的是无意错用了, 还有是将确实存在的引语做了不适当的组合。”他也承认, 在第一次被人问到这些引语时, 他对这些资料的来源故意撒谎了。同时, 莱特因此辞去了他担任不到两个月的《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职务。他的出版人宣布召回已发行的书, 停止电子书的发行, 他的几个演讲也随之取消。80后作家莱特出生于洛杉矶, 200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此外, 今年早些时候, 扎卡瑞亚在哈佛的一个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因与之前他在杜克大学的一个演讲内容非常相似而受到批评。而莱特则因“自我抄袭”了自己几篇发表过的作品贴在纽约客的博客上

而被迫道歉。

八月，让人注意的还有另一位印度作家潘卡吉·米舍尔(Pankaj Mishra)的新书《帝国的废墟：对西方的抵制与亚洲的重生》(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Doubleday Canada, 2012年8月)。维多利亚时期，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个进步的时期，而在亚洲人看来是一个灾难的年代。米舍尔的新书讲述的正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亚洲知识分子寻找出路的轨迹。“到了20世纪初期，现代中国和穆斯林的知识分子开始摆脱欧洲普救论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思想是用道德的手段掩盖了阶层之间的不公平现象。于是他们从修正后的伊斯兰教和儒教中获取力量和尊严。”虽然，书中也谈到印度的泰戈尔等，但主要谈论对象是生于波斯的激进人士贾迈勒丁·阿富汗尼和中国的梁启超。前者在维多利亚后期足迹遍布欧洲和中东，后者试图翻新孔子学说。“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传统文化，但是他们最后都以向古人学习作为化解西方帝国主义的解毒剂。”《卫报》《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多家重要媒体都对这本书以及引起的话题几乎同时给予关注，但这本书受到的批评也颇为犀利：“米什拉描述中存在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梁还是阿富汗尼都不能死而复生。人们从他们的书本中汲取知识，但是很



难追寻他们思想的根基。他们著作的节选在这本书中接连不断地涌现，但是这本书读起来平淡无味，渐渐地你会发现书中堆满了从一些学术著作中拼凑而来的引言。有时你会觉得任何但凡谈论过现代化、伊斯兰教或西方思想的亚洲思想家都会被生拉硬套在书中。有时像爱炫耀的青少年一样时常在书中引用马克思和福柯思想。”

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大西洋》月刊，再次给人惊喜。8月3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新近发现的一段马克·吐温摄于1909年的影像。其宣称，这段影像显然是塞缪尔·克莱门斯，即马克·吐温，留下的唯一的影像。在这段时长1:46的默声影像中，

马克·吐温，这位《大西洋》的作者，抽着雪茄，穿着他标志性的白色套装去散步。这段由互联网档案馆提供珍贵影像，正是由美国电影制片人先锋和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拍摄的，拍摄于马克·吐温去世前一年，康乃狄克州马克·吐温的家中。作为一个科学技术迷，马克·吐温是爱迪生和尼古拉·特斯拉的朋友，他自己本身也有几个发明专利，包括一个手动的弹性的衣服扣。嗯，千万不要问我“手动的弹性的衣服扣”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想了半天也想象不出来，只能告诉你英文叫“handy elastic clothing clasp”。若有人知道，且告诉我，将不胜感激。Q



观察员 戴新伟 (广州, Daypessoa1935@gmail.com)

每次零碎地从《万象》杂志上读到周成林的游记,都深感有推荐的必要——哪怕只是一篇三千字的游记。曾经见到坊间一本书叫《不曾苟且》,觉得很奇怪,这不是写作最起码的要求么,有什么值得大说特说的呢?现在想谈周成林的文字,不免也要沦陷在这种悖论里头,因为也要谈“不苟且”:比如,文字的简练干净。早在十多年前的网易论坛,读到他以melzhou的网名所写的一系列影评(也有乐评),就能感到作者对文体深有体会,有所经营,却又毫不造作。之所以将这么基本的要求“大说特说”,固然可以不负责任地批评周遭的苟且,但要检验也很容易,最近一期的杂志上便有他一篇《在大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看看。

但更值得推荐的是其新作《考工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8月版)。不是影评,也不是他的译作,而是关于自己身世的几篇散文。《浮云》(代序),《乱云》——关于父亲,《残云》——关于外婆,《晚春》——关于祖母,《我们要爱母亲》——显然这是关于母亲的,《暖灰》——关于伯父,《杀父》——还是关于父亲,《冷冰冰》——关于在澳门共事的一个同事,《微观生死》——关于生死,《考工记》——关于八十年代的招工,一共十篇。“片名”可以



看出昔年影评人的影子,但与其说是因为热爱电影而写下自己的故事,不如说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对电影世界里的故事体谅更深。比如他对高峰秀子主演的《浮云》所流露的理解与同情,时隔十年之后,结合这部阴郁的《考工记》,我多少有所了解。简单来说,《考工记》是一个六零后的故事,有浓重的八十年代色彩,但黑暗与粗砾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甚至残酷的关系(且看《我们要爱母亲》的开篇:“从我楼下到她楼下,走路只需七八分钟,但她不知我就暂住附近。她也没有我的电话号码,我想万一哪天,她得重

病，或是老得快要死了，只有妹妹可以通知我。”），个人在社会里的挤压与损耗，而且毫无光明可言（更不要说光明的结局了），令人不快的真实感，这是在今天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和影视剧作里极其少见的。今天不乏公开宣称沉重、巨大、苦难的题材，但为什么依然会给人“苟且”之感？很有可能除了这样宣称的爆破点之外，一无所有，更不要说如何上升到血泪文字的层级了。

从篇幅上来讲，《考工记》仅仅是几篇短的散文而已，但好在文学评价从来不是依靠篇幅。无论是名之为自传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考工记》都可以让人领略到文学的力量，这绝不是随随便便的随笔文字。最近读到田川的《东京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也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其第一辑“杂人”。田川作为留日学生，在东京边上学边打工——而且留学的人中大部分都要走打工这个路子，不仅是留学生的艰难现实，我想也是读者的一一毕竟对于日本，有很多风花雪月纯粹精神方面的文章书籍，这么陡然给人“黯然”之感介绍，不多。

如果以一种通俗的写法，比如留学生故事，那会是全程式的个人经历记录，但《东京记》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作为摄影师的田川在东京拍的最有意思的照片，只不过以文字的方式呈现，简约而意味深长。更重要的是，《东京记》会让人减少很多对日本的想像空间，而落到真实的人身上一一田



川写了他在补习学校的老师，更多的是打工的饭店里的各色人等，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毫无溢美之词，全是讲事情。田川所接触到的，正是这样的人，他笔下的这些中国人、日本人，像他抓拍的人物，省略掉了很多东西，而直接的抓取住了某种东西。不是某种介绍性质的，而是真实的、核心的，比如那个工头安藤，如此的令人不快，又如此真实的存在着，迫使你去面对。这些人物都是这样的：并不一定讨你喜欢，但他就是存在于你的空间里，和你发生着关系。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写的《小萍姐》，结尾所引用《喧哗与骚动》里面白痴儿班吉与凯蒂的某段，隐约传出的似乎正是小说的氛围。事实上，《东京记》的第一辑，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部松散的短篇小说集。而第二辑“杂

事”所写的东京零散故事，则完全“泯然众人”，是中规中矩的日本见闻了。类似这一辑的文字，可以被人复制，但前一辑的眼光、才情，大概鲜有人比得上。

唐诺的《世间的名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那篇又长又好看的《最好的时光》，关于侯孝贤及其电影的这篇文章，可以让人对他占有、解读其他故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比如他为脸谱出版社的一系列推理、侦探小说所写的导读，又比如《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都是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同时密度奇大的文本分析。《世间的名字》所写的故事都像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医生》、《骗子》、《编辑》、《小说家》等，但名字却实在还是在随笔的范围内，终逃不出解读的方式，以《书家》为例，他谈的是对书法的看法、包括自己朋友张大春们对书法的见解，不禁令人想到了叶兆言一个中篇小说《玫瑰的名字》，写的也是“书家”，却完全是小说家笔法了。在随笔面前，小说或许不有趣，不真实，但总是具有可供解读的余地。这或许不仅仅是文体的不同吧。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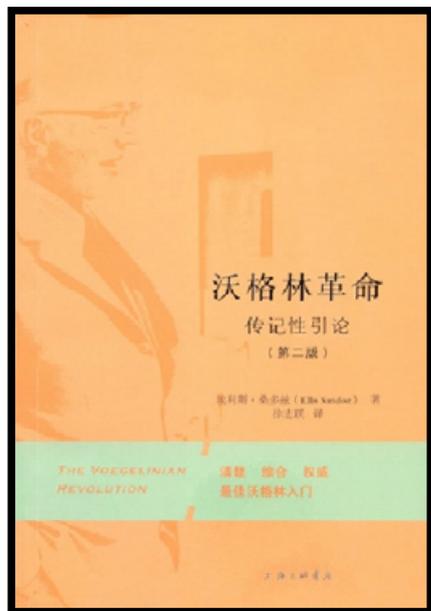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1964年,沃格林在慕尼黑大学开设了一门“希特勒与德国人”的讨论课程,试图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一次彻底的批判,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自传性反思》(徐志跃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7月)中,记述了当时的一些想法,针对纳粹时期的“暴民政治”,他有这样一段曲折而又包含深意的话:

这些粗俗者与和暴民政治的问题不能轻易打发;你不能简单地以不予关注而了事。它们是生死攸关的严肃问题,因为,低俗之人创造并主导了知识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才有可能上台……只有当社会环境被低俗者彻底摧毁时,那种残暴才可能出现,这种低俗精神的真正代表才得以上台。

沃格林笔下的“暴民政治”与“低俗者”,分别指那些受歪曲的“意识形态”所鼓动的群众运动,以及那些不足以把握人的存在真相的“意识形态鼓动者”。甚至在沃格林看来,马克思都是在“自觉充当知识骗子,其目的是为了维持一种意识形态,允许他以一场道德义愤秀来支持对人实施暴力行为。”

人的精神(人心)为何会在各种意识



形态(如国家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乃至民族主义)的庇护下肆意地展现暴力?为何这些意识形态往往是从正义与公平的角度出发,却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对其他群体的伤害?在埃利斯·桑多兹的《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7月)一书中,或许可以了解沃格林对此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在沃格林看来,近代的各种意识形态群众运动,本质上都是人的心灵出现危机,也就是灵魂出现“失序”的症状。具体来说,因为启蒙运动的世俗化,使得基督教等宗教被逐渐地去魅化,但是各种现代的意识形态运

动却又重新给人的存在赋予了“类宗教”的特点，所以无论是奠基在种族论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还是奉阶级论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是“意识形态宗教”。这些“人造的类宗教”放弃了“人是有限的个体”这样的假设，而追求灵知主义所宣称的“超人”，人心中所蕴含的那种狂暴与僭妄从而在“意识形态宗教”的鼓动下得以充分地释放。

如果说沃格林的分析过于晦涩难解，只要稍微环顾这个时代，我们也能直观地发现各种群众运动的特征。简略言之，“群众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在各种“正义”的意识形态庇护下伤害他人，视他人为敌，最终不仅与他们所揭橥的“正义”背道而驰，也充分展现出人心中最为可怕的黑暗面；而“社会运动”则在于，他们尽管也有“意识形态”的支撑，但是他们却或多或少会假定人必须限制某种“过度激进化”的情绪与观念，而不会逾越一些基本的文明准则。这也是沃格林如此否定国家社会主义，但却充分肯定英美自由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因为他认为，后者的制度中已经有效地保存了“真理”的文明内容。

这样的论调，难免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感到有些不适应，毕竟我们长期以来都生活在一种以反抗思想控制为基调的氛围中，“真理论”难免让人感觉某种不自由。但或许值得思考的是，人的精神假如失去了真理



论面向，我们的反抗最终又会指向何处呢？

探讨人心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沃格林的特有风格，而是经历过20世纪各种风起云涌的意识形态群众运动的思想家们的普遍关切。在《**现代危机：政治学评论 1939—1962**》（曹磊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5月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样的反思取向。在雅克·马里坦的在1941年所写的“人类的永生”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文明轻视死亡，那是因为它轻视人类，忽视人生的价值。如果一个文明号召人们耗费生命去追求商业利益、追求暴利、追求对别人的统治或者追求对国家的狂热，那么就不是文明而是野蛮。这种英雄主义就是野蛮的兽性行为。”

或许，这样的价值标准不仅适用于二战后的欧洲，也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

近代的极权主义往往同时伴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事实上，要让现代极权主义得以顺利地运转，“宣传”则是当中的核心秘密。兰德尔·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一书中不仅仅研究了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各种宣传手段，如在媒体、文艺、娱乐等领域如何操弄人心。但是与其他研究“宣传”不同的是，作者显然敏感地注意到极权主义的“宗教面向”，而且他特别强调，极权主义虽然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宗教而言，显得比较拙劣，但是它却符合了群众们对世界观的需求，这也使得极权主义的宣传过程不仅由权力的强制推行面向，同样也有受众的主动配合与心理需求。

不过，从历史角度看，极权主义的宣传难免最终会遭遇“信任危机”，彼特沃克认为这是因为极权主义一方面宣称真理，但一方面却为了遮掩无法达到的目标从而不断地欺骗，从而“宣传与世界被迫形成一种颠倒的关系”。这或许也就可以解释，极权主义国家崩塌之后，往往会发生一场强烈的“信仰危机”，而这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宣传所营造的“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强烈反差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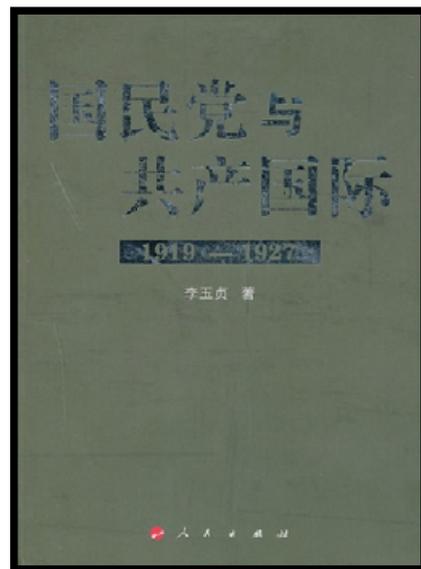
也正是这样不断扩散的反差感，才让任何自我宣称的真理与意识形态，最终会面临强烈的质疑，直至崩塌，这或许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吧。Q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阅读“公共论丛”，是愉快的回忆。

2000年第6辑陈小平先生的《党权政治的兴起及对中国宪政的影响》和2003年第7辑江宜桦先生的《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认同》，均让我印象深刻。陈小平批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反宪政主义和以国家主义为指向的”，“是以民族主义掩盖了自由主义”。他同情地理解，以党治国模式的出现，最初是尝试“以党权制约军权”，但遗憾地指出，“党权最后转化为军权政治的工具”。读过这篇文章，找到陈小平的《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署名陈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可惜这本书仅印了1000册，影响有限。

对民权主义的界定，据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1-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的研究，直接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指出，要让民权主义“不是从天赋人权的角度，而是作为一个革命原则提出的”，国民党一大宣言采纳了这个观点。这种以民权代替人权的逻辑影响了随后的20世纪，凡是支持政权（政权往往隐身在“革命”、“平等”的后面）的都享有权利，凡是反对政权的都不得享有权利。于是，民众只有支持的义务，失去了反对的权利，公民成了群众，群众成为群氓。群氓素质低下，需要政权“训



政”，在政权像保姆一样无微不至的管理之下，民众越来越失去自理能力，像永远无法断奶的婴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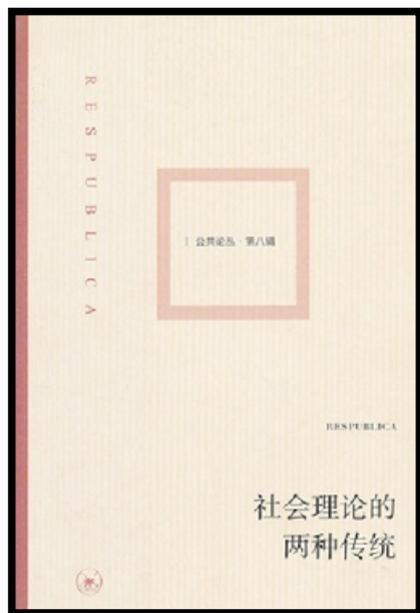
从人权到民权，一方面是全能国家试图把“天赋人权”转换为“国赋民权”，另一方面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个人有着国家认同的诉求。如何满足个人的国家认同，同时又避免国家主义？江宜桦介绍了哈贝马斯的“以宪政制度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即“以基本人权、民主宪政为国民凝聚向心力的焦点，而这样的国家认同需要的不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支撑，而是所有足以培养公民德性的政治文化，譬如理性、妥协、沟通、宽容等等”。在“排外”等于“爱国”

的今天，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又译“宪法爱国主义”），尤其值得重视。

“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所培育的只是一种宪法爱国主义的公分母，它使人们对一个多文化社会的各不相同但彼此共存的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整体性这两方面的敏感性都得到加强。”1990年，哈贝马斯在《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载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里这样说。他还指出：“只有一种民主的公民身份——它不是特殊主义地封闭的——才能也会为一种世界公民地位准备条件。”最后，哈贝马斯希望国家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的关系是一种连续而非断裂。

“暂停”了将近十年，“公共论丛”终于推出第8辑《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7月）。这里所说的两种传统指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但是书中王焱先生对维新变法两个源头的分析同样值得注意。

陈寅恪先生强调变法有两个源头，不可混为一谈：一为康有为的变法，一为郭嵩焘和其祖父陈宝箴的变法。王焱对“康学”的思想配方有着精确的归纳：“是晚清公羊学与近代西方社会政治知识初次格义的产物，包罗极为庞杂散乱，其中既包括传统的法家思想，也有卢梭的包括直接民主在内的民粹主义，乃至中式的至善论乌托邦，以及片段的基督教神学知识等”。公



羊学、法家、民粹主义、乌托邦、神学一起调制而成的学术鸡尾酒，迄今依然热卖。如果以此为线索，写出一部学术思想史，一定别有创见。

与此同时，郭嵩焘、陈宝箴一路的思想谱系被严重忽略。在陈寅恪看来，这个谱系应该还包括曾国藩、张之洞，他曾自况“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再扩展开来，还可以包括冯桂芬、薛福成、黄遵宪、王国维等。他们不是纠缠于古今中西之争，而是试图打破古今中西之隔，“借镜西国”但不反传统，熟读经书但不排外。不过，他们也遭受双重误解：保守者视之为激进，维新者视之为顽固。“公共论丛”第4辑里王焱的《陈寅恪政治史研究发微》值得重温，他指出张之洞是文化保守主义，未必是政治保守主义，

体用之说可以理解为“中学为体，西政为用”。对这个思想群体来说，保守和维新不应是截然对立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治上倾向于立宪和文化上倾向于保守的立场，与时下的“儒教宪政”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儒教宪政”，只是满足于将儒教写进宪法里，与宪政几乎没有关系，与“康学”倒是大同小异，配方是公羊学、马克思主义、精英主义、乌托邦、神学。

金雁先生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梳理了近代俄国的思想谱系，对于“以俄为师”的中国读者而言，读来别有一番滋味。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一下“路标派”。“路标派”指1909年7月《路标文集》（又译为《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的七位作者别尔嘉耶夫、基斯嘉科夫斯基、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等。他们同样是两面受敌——这几乎是所有独立思想者的境遇——遭到来自左右两面的攻击。有些巧合，“路标派”也是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文化上倾向于保守。但不同的是，他们逐渐从现实关怀转移到宗教哲学里。

“路标派”致力于对文化激进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反思，试图使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结合。书中这样写道：“妥协、让步、协商、秩序、保守、温和、法律，这些原本是褒义词的语言在俄国都成了骂人的



话，使相互对立的两头缺乏回旋余地”。这种文化心理，中国读者想必不会陌生。上述词语是不是褒义词，暂且不去讨论，至少它们应该是中性的。文化激进主义的逻辑，一旦进入实践很容易转换为政治激进主义，解放者成为新的压迫者，甚至是更严厉的压迫者。金雁指出，政治的激进和道德的堕落往往并行。这并不奇怪，政治激进往往会引向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本身就是道德堕落的表现。内心缺乏足够的力量，因而急切地希望在现实中获得回报，心灵的脆弱导致手段的强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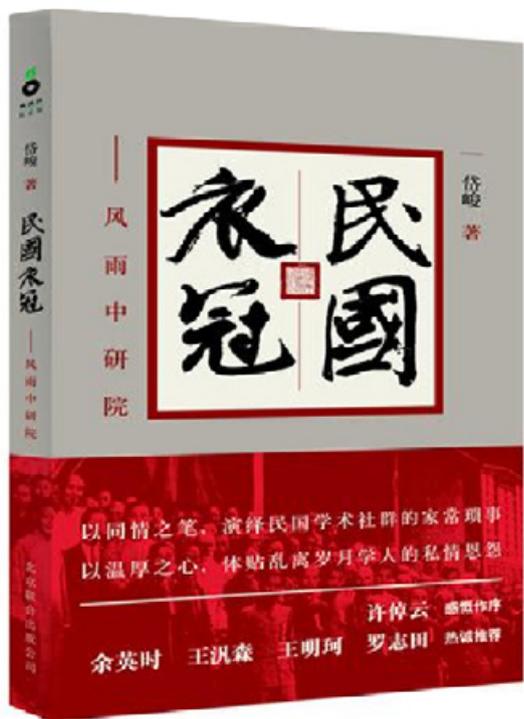
“路标派”寄望宗教哲学能够应对现实和心灵的双重危机，这是针对文化激进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对症下药。但是，他们依然需要面对现实的问题，当宗教和

哲学不再有生存空间，多名“路标派”成员被迫乘着“哲学船”去国离乡。他们的主张如何在故国扎根？金雁还指出，知识分子“告别革命”，并不等于革命不会发生。

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谱系的梳理，留有很多空白，但是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人物的书写，随着“民国范儿”的流行已经呈现出开采过度的迹象。上中下三部的《南渡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虽然频频登上好书榜，但书中人物之风度与作者语言之粗鄙形成反比，让人无法卒读，倍感惋惜。相比之下，在众多相似题材的著作中，岱峻先生对民国人物的理解更更见功力，但是著作更不为读者所知。或许，这种状态更能够体认民国人物。在《**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9月）里，作者不仅描写了那些民国士人的经历，更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与之对话。对游寿、曾昭燏诸先生的钩沉，尤为值得回味。

董时进先生同样是一位值得钩沉的人物。这位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49年致信最高官员，发表对土地改革的不同看法，2011年第4期《炎黄春秋》刊出了这封信件，董时进也逐渐为读者所知。他于1950年赴香港，1957年再赴美国，直至1984年病逝。《**两户人家**》（学林出版社，

2012年5月）是董时进的自传体小说，虽然作者声称书中人名和地名一般是虚构或借用，但是具体情节多有所本。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有限，但颇具历史价值，呈现了乡土中国面对“现代”和“世界”两个庞然大物时的景象。前半部平铺直叙，如话家常，多是鸡毛蒜皮；后半部跌宕起伏，如坐过山车，多与时代风潮有关。一缓慢、一迅疾，这种叙述节奏与乡土中国的变迁速度暗合。后半部分讲到的学堂往事，对于“民国范儿”颇有祛魅效果，可惜董时进不曾专门撰写一本学术回忆录。🔴



从“地下”窥探启蒙运动



特约撰稿人 凌越（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开篇部分，美国法国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即亮出自己研究启蒙运动的基本方法论，一种有别于惯常的从正面的几位主要的启蒙思想家的视角观察整个运动，而是别开生面地从自己所掌握的珍贵史料中潜入启蒙运动的底层，从那里去呈现启蒙运动中那些活生生的画面和细节。因为“对于18世纪精神史的鸟瞰，已经得到经常和完备的描述，因此，开辟出新的方向，深入启蒙运动的底层，甚至是潜入其地下社会”或许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对于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历史真相而言。视角从鸟瞰的转变近距离地审视，必然将扭转我们对于事物的刻板印象，而通过把事物置于陌生的光线下，一系列原生态的历史草图也就比一个庞大但细节模糊的全景图更能有效地描述这个世界。

这个立意求新的主意尽管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人们通过何种媒介潜入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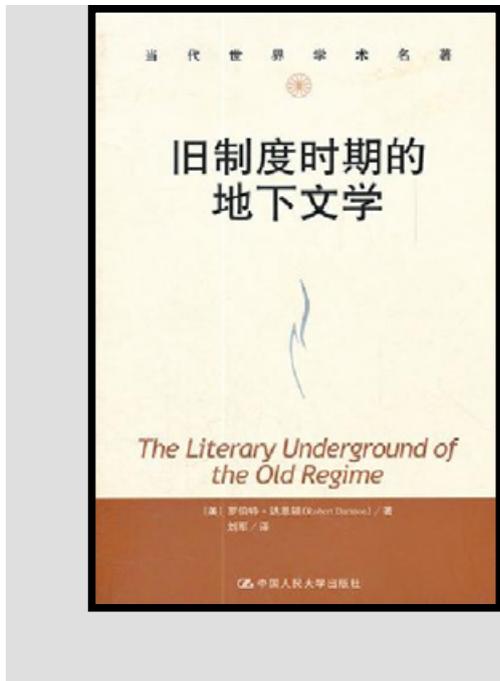
的底层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了。而这把向下的梯子对于达恩顿来说，就是保存于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文件。该印刷公司是启蒙运动时期在法国边界附近出现的众多出版社中的一个，这些出版社是为了供应法国所需要的盗版和违禁书籍而出现的。这些文件包含着关于18世纪出版社生存状况的最丰富的信息，在书的前言中，达恩顿道出了阅读这些之前尚无人问津的档案材料的感受：“这是一种特别的感觉，它们是否出自巴黎的阁楼，一个年轻的作者在那里奋笔涂鸦，他的眼界悠游于文坛和一楼房东太太的威胁之间？他们是否会令人想起偏远山区的造纸者的辛劳，在诅咒着天气毁掉了他们的身体，邮差送错了信件？……这些文件可以带你进入一家印刷所，在那里，工人在印刷机前弯腰弓背地劳作；或者带你到柜台前，那里摆放着煽动性的书籍；或者是巡回

的路线，商人沿着它们在马背上传播启蒙运动。”

经过仔细阅读，达恩顿决定参考法国的补充材料——警方、巴士底狱以及书商行会的档案，着手研究18世纪法国书籍的写作、印刷和流通，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在于考察它们对于启蒙运动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是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秘密文学作品大全》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启蒙运动的生意》是讲述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出版史，第二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关注18世纪法国地下图书市场里热销的书籍本身——书的鉴定、书的扩散以及书的文本，第三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则是对普遍性的图书出版与销售的研究。事实上，《启蒙运动的生意》对于达恩顿关注的最重要主题——启蒙运动究竟有多深入地渗透进法国社会——有更为切实地回应。《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由于将重点放于禁书的内容(这本书也刚刚由华东师范大学出了中文版，书的第四部分“‘哲学书’简编”就是节选了三部当时最走红的禁书《开放的特丽莎》、《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引起读者的好奇心自是不在话下。

《旧制度时代的地下文学》虽然也有一个颇具魅惑感的书名，但是它对于当时整个书籍市场的辨析和描述却时时透出严谨的学术色彩。

因为是一系列的“原生态草图”，所以《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各章节间，



缺乏纵向的一致的逻辑链条，由于受到所掌握材料的限制，它们更像是一个个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的历史横切面。第一章“高贵的启蒙，卑下的文学”立刻将启蒙运动带入尘世（而非教科书作者所描述的那种纯净的舆论氛围），从18世纪作者的视角审视它，因为这些梦想着功名和金钱的狂热的作者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想要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出人头地。达恩顿以如今并不算很有名的启蒙运动全盛期的哲学家絮亚尔为例，描画了那些掌握特权处于上流社会靠年金养肥自己的学术精英们，他们业已爬到社会的顶层，享受着每年一万或者两万里弗尔（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收入，以及旧制度最后的时光里的所有快乐。但另一方面大量散布在格拉布街上的作者却陷入文学无产者的状态中，这些被伏尔泰称为“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的文

学贱民”哪怕稍具才具就梦想着成为哲学家，他们从外省涌入巴黎，他们自己无力从事任何有益的工作，他们靠写诗和梦想生活，死于穷困潦倒。小克雷比永，一个巴黎警方的书籍审查官员，据说每年给四万到五万本诗歌小册子签发警方许可证。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作者根本没有出路，因为绝大多数的机会都被旧制度中无处不在的特权阶层剥夺了，他们陷入穷困之中，并非因为他们的早期作品比较激进，而是因为以垄断为特征的旧制度阻止他们进入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蜗居在阁楼上的文人仇恨旧制度的激情被点燃，恰恰是他们构成大革命的生力军，在他们的激情中裹挟着启蒙思想的碎片和个人欲望的洪流，伴随着革命一代新的精英被创造出来，而他们在穷困潦倒时炮制的大量小册子，则为他们日后在国民大会上滔滔不绝的发言拟好了底稿。

第二章《格拉布街的密探》挑选出格拉布街上狂热小册子作者之一的雅克-皮埃尔·布里索作为研究个案。布里索是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自1779年8月31日以来，他一直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通信，这些信件记录了布里索转变为一个册子作者的过程。布里索最初的信件激荡着年轻人的热情，立志要使自己成为一名哲学家，但到1784年他的热情消弭于沉重的财务负担之下。书中全文引用了布里索1784年10月22日寄给纳沙泰尔公司的一封信，以下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我正采取步骤使我的《法律哲学藏书》在法国获得许可，并且很肯定我能够得到这一恩惠。为此，请立即通过贝桑松的驿站马车寄两套已装订的第六卷到第九卷给巴黎警察总监勒努瓦先生，以及第十卷，如果已经付印的话。

它表明，布里索能够从警方的手里把之前被扣押的书籍弄出来，而且很可能是通过巴黎警察总监勒努瓦的关系。在达恩顿看来，这封信大致可以解决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即布里索有没有做过旧制度时期警方的密探，并从中获利。随着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派和吉伦特派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对于布里索充当过警方密探的指控一直没有中断过，当然，布里索的反驳也总是底气十足，充满了英雄式的悲壮色彩。他不断地要求指控者拿出证据，因为他知道，关于他的警方记录已经因为巴士底狱的陷落而消失了，他的密友曼努埃尔（大革命后接管警方部门）将记录交给了他，“同时告诉我，没有任何关于我的东西应该留在警察的牛粪堆里”。达恩顿通过收集到的各种资料，而且对这些资料本身都有缜密的合乎逻辑的分析，基本将布里索充当过警方密探的指控坐实，但是达恩顿的目的似乎又不仅仅在于吸引眼球的揭秘报告，而是从深层心理来观察这些革命者进行革命的隐蔽动机，无论如何，是旧制度本身培养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因为其阴暗的统治也培养了那些不计后果的阴暗的反抗者：“密探活动败坏了他，在败坏他的

过程中，证实了他对旧制度的仇恨。他肯定唾骂过那些控制这个体制的人，他们先是妨害了他获取荣誉的努力，接着，又把他变成了密探，以此来羞辱他。”

第三章《逃亡中的小册子作者》的主角叫着勒塞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1780-1784）和纳沙泰尔公司频繁往来的生意信件，如果不是达恩顿以这些信件为原材料撰写学术著作，他将完全消失于历史的茫茫黑夜中。勒塞纳只是那个时代一个极为普通的雇佣文人，他们怀揣着梦想和自己苦心撰写出来的各种异端小册子，四处寻找出名和赚钱的机会，但是最终作为个体的他们都彻底泯灭了。但是达恩顿指出，也许正是这些雇佣文人完成了将启蒙观念通过哲学家的思考而传递到读者手中的过程。勒塞纳们汇编、浓缩、推广和兜售启蒙运动，犹如他的生命取决于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启蒙运动就是他赖以糊口的食粮。根据纳沙泰尔公司保存的信件，勒塞纳是由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达朗贝尔推荐给纳沙泰尔公司的，此后勒塞纳每周至少写一封信给纳沙泰尔公司，不断地给他们提供各种出版书籍和杂志的建议。同时，他在信中还不忘将自己打扮成正直的文人共和国的公民，他和他的合作者在给纳沙泰尔公司的信中担保彼此的美德，但是很快他们就因为战利品而分裂，并在随后给纳沙泰尔公司的信中诋毁彼此的道德。如果有更多的才干、金钱和运气，勒塞纳有可能成为一个受尊敬的哲学家神甫，但“我

们被受诅咒的环境驱使，驱使得非常残酷”，他堕落为一个逃犯和弃儿，在萧杀的冬天步履蹒跚地奔波在乡间，靠施舍过活，化名东躲西藏，以逃避密札的追捕。就勒塞纳而言，他是否在大革命中起过作用现在不得而知，因为他在1784年失踪了，但是这个籍籍无名的狂热小册子作者仍旧具有代表性，他在信中流露出的狂躁气质和隐藏的愤恨情绪恰好解释了大革命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那是对一个腐败已经渗入每一个人内心的制度深深的本能的仇恨。

第四章《外省的地下书商》和第五章《边境对面的印刷所》主要介绍纳沙泰尔公司的运作情况，因为缺少富有戏剧性的中心人物，也就没有前两章那么吸引人，但是这两章对于那个时代文化氛围的形成以及图书交易的细节，仍然有清晰细致地交代。第六章《阅读、写作和出版》显然是总结性章节，达恩顿试图将被离奇的历史人物和揭秘性的历史文件引开的注意力，转回到他撰写这本书的中心议题上，即旧制度下的文学文化是什么性质？在18世纪，谁生产书籍？谁阅读？他们是什么人？并以此为基础去尝试理解启蒙运动的文化和背景。全书的结尾部分非常有力，并起到点睛之用：

“这是怎样的情形啊！一个将其最先进的哲学与其最低劣的色情作品相提并论的政权，是一个自我削弱的政权，一个自己制造地下社会的政权，一个鼓励哲学堕落为毁谤作品的政权。”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在方法论上《旧

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显然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在年鉴学派看来，来源于叙述的资料（所谓的正史）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编年的框架，他们更看重那些当时的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因为这类史料更为可靠，尽管仍然要对这些史料进行辨析。达恩顿所采用的纳沙泰尔公司的档案材料正是无意识留下来的材料，它们在达恩顿缜密的分析下，呈现出极为新活生动的历史画卷，让我们对启蒙运动的历史有了另一层富于质感的了解，而不是仅仅纠缠在几个正确的观念和事件之中。在有关对历史采取“评判”还是“理解”的研究态度上，达恩顿显然也是站在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理解”这一立场上，通过所掌握的材料，达恩顿了解了布里索、勒塞纳们有违道德的秘密，但是达恩顿并不急于给出道德评判，而是强调“基于新的资料来源，重新审视布里索的生涯，会给他的传统形象增添一些阴影和鲜活色彩。这样做，不是为了揭露回忆录（布里索自己的回忆录）背后赤裸裸的个人，而是为了理解大革命的形成，理解那个他被视为典型的年代”。

上帝的小提琴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



《上帝的小提琴》是一部讲小提琴大师海菲茨的纪录片。我看完之后，第一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个细节：学生回忆起他教课，如果谁没拉好会被罚款，一般是五毛，收集起来给比较穷的学生买谱子。还有人被罚款是因为没去听米尔斯坦的音乐会。如今那个收集“罚款”的存钱盒还在，是一只土里土气的大嘴巴小丑，一按后面就吧嗒一声吞掉角子。这个细节竟然深深触动了我，也许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那个人的气场吧。一个陶瓷小

丑玩具和那个神秘的人，竟然有这样的联系。喜欢音乐的人也许自然有这样的“天线”，乐于接收大音乐家的一物一景。片中的人物也是如此，海菲茨说笑话，海菲茨打乒乓，海菲茨在电话中说了好几声Hello——包括小提琴家帕尔曼都这样津津有味地回忆一丝一丝的细节。

关于海菲茨的天才的种种神话，我不用重复了，因为也不知从何说起——关于他的音乐，可说的太多。当年他才十多岁，演奏生涯就如同直升飞机。不过年轻时

候，在众多“脑残粉”的赞扬中，渐渐有人开始批评他“缺乏深度”，他当时受伤得想自杀。一切都过去了，他渐渐成为真正的大师。

海菲茨的确太让同行羡慕。他生前占尽荣华，死后也矗立在古典音乐的众神殿里，不过这背后的代价一言难尽。他不会大爱，也不太被人爱，——虽然崇拜和尊重他的人数以万计。从这个片子里，我读出的信息就是“孤独”。不管做什么事，达到这个高度之后，能交流的人寥寥无几，真是高处不胜寒。他也许天然有着拒人千里之外的性格，也许是在特殊的地位上，被环境驱动成了这样一个人。

他有两次婚姻——都终结于离婚，三个孩子，但他竟然一点点爱都舍不得给予亲人，不，他完全没有爱的能力。他说自己充满负罪感——要是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就好了，而什么都有了，才发现自己根本当不了父亲，也不能忍受婚姻。他承诺妻儿的事情，一件也办不到。因为演出太忙吗？也许是，可他倒肯花时间在主流社会交游。

话说《上帝的小提琴》这个片子，让我难忘的另一位是个亚裔女士，阿格斯（Ayke Agus），看上去和海菲茨关系很近，提起他时有着发自内心的依恋和爱怜，我有点好奇，她怎么对海菲茨的鸡毛蒜皮这样了解？正巧，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我了解的海菲茨》（Heifetz—AsIKnewHim），作者正是这位女士。原

来，阿格斯本人也是了不起的音乐家，难得的是钢琴小提琴都很出色，她跟海菲茨学小提琴的时候，偶尔被他发现了钢琴才能，于是他要她放弃小提琴生涯，给他做钢琴伴奏。这件事定下来，阿格斯跟海菲茨相处十五年，其间她有自己家庭和小孩。她是他的私人秘书、伴奏、厨师、司机、知音，也是打杂的，常常跟保姆差不多。很多人读到这里大概想，这差不多是情人了，一男一女频繁单独相处在一幢房子里，难道就没擦出火花？不过我宁信其无。海菲茨和女人长相厮守，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情人之间是要求平等的，海菲茨没法照料别人，爱人如己，倒只有这种老板—雇员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为什么挑中了阿格斯？据她自己说，她是印尼—中国背景，有着亚洲女性的坚韧、柔顺、善解人意，尤其能体贴老人（他们相识时，他七十岁，她二十岁），在音乐上也让海菲茨十分尊重，再加上两人的共同之处——都是曾经的神童，都早早开始养全家，都受父母严责而叛逆。海菲茨去世后，阿格斯完全无所适从，不知怎么支配分分秒秒——整个世界都变了颜色。

后人回看这段关系，难免视为天意。

而另一位大音乐家，霍洛维茨，和海菲茨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固执、脆弱、任性、不会爱，能把身边的人气死。不过，许多天才怪人可能生来是天才，但并非天生是怪人，他们的自恋、自我保护、

害怕接近别人的毛病，其实是在环境中形成的。既是众望所归也是众矢之的，明星本来就会比常人遭受更多的误会、嫉妒和伤害，而古典音乐明星还有一些特点，比如格外孤寂，他们需要自幼严格的练习，再有就是对艺术的极度苛求。而这类精益求精的经典艺术，和日常生活有着清晰的距离。没有童年、自幼就被拔出普通土壤的人，日后的生活是难以预料的，谁也难说环境和他们的剧烈冲突会把他们的人生推到哪里。最终，有人正常，有人敏感，有人狭隘，有人慈悲。

海菲茨虚荣吗？爱名声吗？他活跃在舞台上的时候，从来不给自己做广告，躲避采访，不评论自己和同行，不许崇拜者靠近，然而可以想象的是，他对名声非常在意，知道公众之可操纵，知道他们容易忘记明星——哪怕他这样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海菲茨退休后，真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了，乐迷不会忘记他，但年轻人们，如果不是音乐爱好者的话，确实不了解他了——曾经躲避粉丝的海菲茨，现在可不会因求仁得仁而高兴。细心的阿格斯发现，和海菲茨出游的时候，在身边安排至少一位听说过海菲茨的伙伴，才能让他保持愉快的心情。那么海菲茨是个卑琐的人吗？当然不是。他常常对自己的管家很吝啬，向人借了钱也不主动还（他的原则是，被借钱的人应该主动去要），但他在战争、灾难中慷慨地捐款——可以算是最早捐款的名艺术家之一，他还到危险的前线

为士兵拉琴。他将余生的二十五年献给了教学，希望把自己的老师奥尔的传统接下去。

判断他人是难事，判断艺术家的为人尤其是刺多扎手的话题。我不敢妄评前人，但还是想起傅雷的话，“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我对此颇有疑惑。人要活着，音乐家和人是同时做的，也是互动的，怎么可能做完一个再做一个？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也未必曾经刻意“做人”。而艺术家们中，人格不平和、心理褊狭、病态的多不胜数，因为艺术这件事，本来就 and 人生和世界的非常态相关，至少，“非常态”那部分，在表达中会获得额外的鼓励而生长。我怀疑人如果心胸开阔淡然得一马平川的话，还要不要当艺术家。艺术本来就是“执”与“偏”的产物，是想不开的人、有问题的人所为。当然，艺术是多样的，艺术家也是多样的。艺术家中也有人格伟大、充满爱心的人——就像和艺术无关的群体一样。恐怕谁也无法证明，艺术家中的爱心人士，比例一定更高。对天真的人来说，艺术代表着高尚，又和种种美德完美融合，是理所应当的结果，也适合写进教育方针和人生理想，这说起来非常合逻辑。然而世界总是充满讽刺。

要说什么是的条件，我倒觉得，是做艺术家这件事，能够把人带动成为一个比较纯粹的人，因为其路之艰险和孤独。但任何艰难的事情，无论是体育、科

学、慈善还是照料卧床病人，都可能使人纯粹，所以跟艺术这件事，还是没什么直接关系。

这样说来，艺术不一定让人幸福、快乐、高尚，倒可能把人逼得失去人性，那么艺术有什么用？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然而不管读完海菲茨什么样的故事，他的演奏一如既往地整饬、热烈。那团生命之火的全部意义，也许只有存在。世界残酷、生命弱小——观看他人的艺术何尝不是对自我的怜悯。❶

构筑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

ESSAY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今年7月末,日本《朝日新闻》上海支局的一名资深特派员记者,因采访启东事件遭到当地警察的殴打,记者证和照相机被没收。因时间上刚好处于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前夕,事件显得格外敏感,相关微博很快被删除。该事态带来双重遗憾:首先,记者在第一时间便向警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仍未能逃脱暴力;其次,启东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日资企业王子制纸,这是一家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实力的老牌上市公司。随着记者调查采访的深入,很可能会发现某些有价值的线索。一旦发表,以《朝日新闻》对日本主流社会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日本国内所引发的舆论效应也许会对中国的报道阻力形成某种“牵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暴力不但打掉了中国的自信,很可能也打掉了通过两国舆论互动,推动中国民生问题解决的一线良机。

该事件并非孤例。事实上,近年来,由中国内地警察实施的针对日本新闻工作者的暴力呈明显的上升态势:2008年8月,两名日本媒体(《东京新闻》和日本电视台)驻北京特派员在新疆喀什地区采访时,遭中国武警殴打、拘留;2009年60周年大庆阅兵前夕,共同社等3名日本记者因从北京饭店一室隔窗拍摄阅兵彩排,遭公安突入室内殴打,笔记本电脑等器材被破坏……而且,笔者曾亲耳听一位受害当事人的记者朋友说过,暴力发生后,甭管日方如何抗议,中方都不可能向日方“道歉”,“表示遗憾”——是日方所能得到的中方最“低姿态”的表示。

战后中日两国互派记者制度肇始于1964年9月,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日本驻华记者的话语权及其影响力,基本与中日关系的历史成反比——越往后,越不济。从两国复交前到80年代的

图为2012年9月15日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高举毛泽东像,并向日本大使馆投掷鸡蛋。摄影: Jason lee

“蜜月期”，日本各大媒体的驻华特派员是享受跟廖公（承志）^注定期在京城割烹料理开“吹风会”待遇的，随便一位《朝日新闻》或共同社的特派员，都掌握“通天”的情报管道……开始走下坡路，是在90年代中后期；而实质性的式微，则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在中日世界“老二”的经济大国地位易位之后，开始加速。可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在中国内地各种事件现场“非法”采访，美国及那些经济实力远逊于日本的欧盟国家记者，却不见被无礼应对，唯独日本记者，屡屡成为施暴的目标。日本媒体从曾几何时，与中方领导人觥筹交错、独享“通风会”的踌躇满志，到21世纪初叶“提前”享受大陆新锐商业媒体的“国民待遇”的事实，是一个微妙的隐喻：在中国政府的眼中，日本已然坠落为“二流”国家。过去十数年来中日关系之种种，或有意，或无意，客观上均可为这点背书。

整整十年前，笔者应《人民画报》的邀请，以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包括对外友协副会长和前新华社驻东京分社首席记者在内的老一辈“日本通”。他们都曾为毛、周等领导人做过日语翻译，亲历过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全过程，对“中日友好”抱有真诚的信仰。可是，就在他们退居二线、期待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日关系“瓜熟蒂落”的时候，却迎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局面。

面对这种不尽人意的状况，老一辈“中日友好”人士难掩失望，可他们却苦于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一筹莫展。两国媒体则纷纷以“大幅倒退”、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等评价对现状作出各自的“审判”。可殊不知，“大幅倒退”之后，还有更大的倒退，过了“最低点”，还有更低点；结果，越往后，“事故”越多，关系越僵——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30周年时，人们没想到在小泉政权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双方居然彻底背过脸去，作“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状；而好不容易送走了小泉纯一郎，在民主党政权下，人们断不会想到会有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最是两年后的8月15日，香港保钓人士再次登陆钓鱼岛、宣示中国主权，连同两名凤凰卫视记者在内，一行14人悉数被日方以所谓“非法登陆”的嫌疑逮捕（48小时后被“强制遣返”）的事件，使一年来，从石原慎太郎的集资购岛计划，到“终战日”前后，国会议员们的靖国参拜等骚动，统统相形见绌。至此，由两国政府主导的、计划中的邦交正常化40周年系列“庆生”活动，在世人眼中，几乎成了笑柄。

从30周年到40周年，两国政府的推动不可谓不力，从首脑互访、国际场合（如APEC等）峰会，到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定期召开、政府间战略对话（如中日安全对话、经济对话等），到各种层

^注 廖承志（1908~1983）：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1924年，如国民党。1927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年参加中共东京特支组织，后遭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参加长征。建国后负责外事工作，是中共的统战事务的负责人，并实际主导中日复交谈判。历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侨办主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次的论坛、交流活动，不一而足。可结果却有目共睹：衰退进程不仅未被遏止，反而有所加剧。种种迹象表明，中日关系的这种从上至下的“顶层结构”配置，经过四十年的“超期服役”，能量已基本耗散殆尽，亟待系统的维护、升级。40年来，不，其实是自从两国在战后初期开始恢复民间贸易，中方“以民促官”，以“渐进”的策略谋求推进邦交正常化以降的60年来，虽然有过颇为频密的“民间外交”时期，可谓极一时之胜，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那些参与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所谓“民间机构”，在日方来说，虽然大部分是纯民间组织，少数具有半官半民的色彩，可在中国来说，则统统是不折不扣的官方机构，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贸促会，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从中国渔业协会、中国农业代表团，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协会，等等，其实都是以“民间”的名义，为邦交正常化铺路。

譬如，为了回应一年前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和齿轮座剧团在北京的访华演出，1972年7月，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并在东京举行了盛大答谢演出。孙作为中方对日工作和中日贸易联络事务的负责人，竟被安排率文艺界的代表团出访，是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我自己也没想到，就在这次率舞剧团访日

过程中，出现了对中日关系非常有利的高涨形势，国内要求我们因势利导，配合工作，以推动形势的发展，我是被推上了与芭蕾舞没有多少关系的另一个舞台。”^①包括80年代，被认为是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大手笔”的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空前盛举，虽然应邀访华者来自各行各业，绝大多数系纯民间人士，但对中方来说，仍是政府行为，实际负责接待工作的则是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中日友协。诸如此类的官方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国家盛宴”，虽然能有效推进或部分实现国家的既定战略目标，但由于民间草根的长期缺席，也抑制了作为中日关系社会基础的民间交流机制的发育，造成了今天中日关系中“顶层结构”过分肥大，而“底层结构”发育不良，甚至根本付诸阙如的“一头沉”状况。

如此民间长期被“代表”、“越俎代庖”的结果，是形成了官民双方对日本问题及中日关系的判断标准的错位和表达的“温差”：如包括战争赔偿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一般认为，随着两国复交，在中日关系三个基本文件（即《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有所规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从90年代初开始至今，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却始终不绝，政府的公式立场显然并未尽涵盖草根层的权利诉

^① 转引自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264页。

求；再如，2005年春，京、沪、蓉等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并引发了针对日本使领馆和日资企业的暴力。关于这场反日运动的起因和背景，至今扑朔迷离。一个主要的导火索是日本“入常”问题。此前，日本政府曾在国际社会发动公关战，与德、印、巴西等国结成攻守同盟，欲谋求正面突破，并正式请求中国，寻求“理解与支持”。对此，中方既未否认，也未予实质性应对。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唯恐日“入常”的“企图得逞”，遂发动反制。开始时是网上请愿，短时间内便征集了1100万名网民的签名，接着便发展至上街游行。事实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拥有一票否决权。只要中方不认可日本的诉求，其“入常”断无一丝可能。正是官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误判，导致了令人遗憾的结果，也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陷入被动局面。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今天，政府主导的“顶层结构”已日益呈露边界。一味地“反串”、“代表”民间角色，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产生副作用。尽快构筑、完善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实乃当务之急。法德关系之所以强大稳固，不可逆转，除了制度、价值观与文化的“兼容性”外，与两国全方位、多层次的民间交流有直接的关系。

以德法关系的坐标观中日关系，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可东亚毕竟不是欧洲，德法也不等于中日，中日关系只要能朝好的方向发展，假以时日，涓流成溪，集腋

成裘，也许本无需焦虑。惟两国关系的结构性不合理，即“一头沉”的状况一日不改变，中日关系终无法从根本上规避在某些关口上倒退、逆转，甚至“归零”的风险。这也是中日关系从20年到30年，30年到40年，却始终无法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应对的“药方”，只有调整结构，扩大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交流，而不是单纯依赖由政府“反串”的、以“民间”为看板的“国家盛宴”，变“一头沉”为“两头沉”，舍此无他。

就笔者的视野和思考所及，大致说来，窃以为应从如下几点着手推进：

首先是简化签证手续，为两国国民的民间交流创造条件。众所周知，国与国的外交，最重要的原则是对等原则。但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在签证政策上严重不对等。今天，随便一名日本人来华观光旅行，或会友洽商，均享受在入境口岸落地签证的待遇，且每次可在中国境内滞留15天（事实上的免签待遇）。可是，中国人赴日旅行，则需繁杂的手续（其中不乏与赴日者个人年收挂钩及地域歧视性措施）。而且，这还是经多次“改善”后、大大“简化”了的结果。

日本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其国内早已废除户籍制度和任何形式的身份歧视。中国人去日本，是为了学习、借鉴其文化和先进的文明（包括制度文明），同时也会带动日本的消费，贡献其经济增长，可谓“双赢”。作为邻国，日本理应以自身的经验和实力，来助力中国的民主

化,这也不失为对自身最大的“保险”。可日本却反过来以早已为自己所摒弃的方式来要求中方和中国人,这不仅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而且与普世价值相抵触,从而招致中国人内心的反感,得不偿失。我们注意到,去年8月,日本已经与台湾实行签证互免。诚望中日两国外交口,真正本着现代外交的对等原则,进一步简化赴日签证手续,以方便中日两国国民,特别是草根对草根的交流。笔者有一个大胆设想,以中日两大国为“先导”(其实已难称“先导”了),实行签证互免,不久的将来,像欧盟那样最终实现整个东亚地区的区内免签。这将极大有利于地区的繁荣。诚望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共同推进这个愿景。

只有签证手续简化,才有可能有效推进第二、第三步,即中国民间“知日派”与日本民间“知华派”的交流和两国媒体的交流。先说前者。由于历史的渊源和某种同样源于历史的怨怼、情结,中国民间颇有一些“知日派”。他们不是外交官,也不从属于任何体制内的学术机构,甚至来自草根。但他们思想活跃,以互联网及社交网络为获取和交换信息的手段,知识更新快,且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任何功利目标,仅以“知日”为志业,有些人还拿出了过硬的成果,在媒体和某些学术领域有相当的影响力。而日本,也历来不乏外交界和学术、媒体圈之外的在野“知华派”,对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前,碍于中日关系民间长期缺位的“一头沉”状

况,这两部分意见人士绝少与对方国家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接触,交换意见,更鲜有觥筹交错、面对面碰撞的机会。随着两国之间包括签证在内的种种樊篱的拆除,这两部分人士如能定期交流,加强沟通的话,将会起到两国“体制派”所起不到的作用,对两国民间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和解,善莫大焉。

日本历来有种根深蒂固的战略思维,总是试图通过培养、扶植“亲日派”,来抑制对方国家的反日情绪。他国情况如何,另当别论,但事实证明,至少这种思维在中国难以奏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源自历史的情结,“亲日派”虽然并不能与“汉奸”划等号,但基本上是一个负面词汇。一个人一旦被打上“亲日派”的标签,便意味着作为有限,甚至会被“雪藏”。因此,与其培植“亲日派”,不如寄望于“知日派”,后者能量更大,影响也更广泛、持久。从长期的视点出发,日本唯有扩大敢于对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知日”层,才能有效制约中国社会的“反日”情绪性发作。客观上,一个对主流社会有相当辐射作用的“知日”层的存在,能理性地看待、评价对方的长处,了解双方共同利益之所在,以平衡感良好的国际观,冷静、温和地应对、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棘手问题,恰恰是维系和平、双赢的两国关系的重要砝码。

第三是两国媒体的交流。日本书店里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碰鼻子碰眼,但多是负面的;而随便去一处京、沪的报亭,各种新闻类报刊杂志传递出的氛围,

总给人以仿佛下周就要开战的错觉。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钓鱼岛主权纷争的升温,“中日必有一战”论甚嚣尘上,一些媒体甚至公开谈论解放军拿下日本列岛所需日程表(从“一月论”到“三月论”等),言外之意,胜负已不在话下。在双方社会中如此聒噪喧嚣的民族主义声浪,其来有自,我虽然不认为应当由媒体来负全责,但两国媒体理应同时承担起为各自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潜流“疏浚”之责,否则后患无穷。为此,中日媒体的深度交流成为当务之急。只有两国媒体人之间建立起基于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互信,才有可能通过对方的报道,去了解那个社会中的合理与不合理,并尽可能客观、理性地向自己国家的读者传达事实,解读其背后的发生机制及背景,并提出规避风险的建言——媒体所谓的“建设性”,此之谓也。

两国媒体交流,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它要求那个国家对外部世界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而开放则源于自信。北京奥运前夕和日本“3.11”巨震后,两个国家均有不错的实绩。奥运期间,外国媒体在北

京街头采访,一度相当自由,也多少洗刷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自由的负面“成见”;“3.11”震后翌日,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遂开通了赴灾区报道新闻记者绿色通道,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商业媒体记者在第一时间拿到签证,火速奔赴日本灾区,以连篇累牍的超大版面,全方位、多视角地呈现了巨震之惨烈和灾难中井然有序的社会及日本国民特有的文化心态。日本虽然是一个言论、报道自由的国家,但如此大规模、高密度地接纳外国媒体,特别是来自有过历史恩怨的邻国的新闻记者,在战后是破天荒的事情。

但是,毋庸讳言,“负能量”始终存在,并有抬头的趋势。从上述在启东事件中成为“牺牲”的《朝日新闻》上海支局特派员的个案亦能看出,开放两国媒体交流,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关涉那个国家彼时方方面面的情势、心态及背后一整套游戏规则“升级”。但新闻媒体是社会的触角,逐步开放媒体,让中日媒体人自由互动,无疑是两国普通民众自由交流时代的前奏。对此,笔者愿持一份谨慎的乐观期待。□

“即使只有一个政治犯， 也实在太多”

——昂山素季 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演说

2012年6月16日

译者 周迪灏

尊敬的国王陛下，各位王室的殿下，各位挪威政府的阁下，以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卓越的委员们，我亲爱的朋友们：

许多年前，对我来说那有时甚至像是几世之前，我在牛津的家中和我的小儿子亚历山大一起听一个叫做“荒岛唱片”的电台节目。那是一个很著名的节目（就我所知它现在依然风靡），它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人谈谈如果他们被放逐到一个荒岛，只

被允许带上八张唱片、除开圣经和莎士比亚全集的一本书，外加一件奢侈品，他们会做何选择？我和亚历山大都很享受这个节目，快结束时，他问我可曾想过自己会有可能被邀请去“荒岛唱片”节目做嘉宾。“为什么不呢？”我轻快地回答。但他知道，大体上说来，只有名人才会被邀请去参加这个节目。所以他便兴趣盎然地追问我觉得自己会以什么原因而被邀请。我考虑了一会



图为2012年4月缅甸国会议员补选期间，昂山素季的支持者高举她的画像，支持她代表缅甸民主联盟竞选议员席位。摄影：贾代腾飞

儿回答他道：“也许是因为我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呢！”随即我们都开怀大笑，这个愿望如此令人愉悦却又那么难以达成。（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为什么这么回答了，也许是因为我当时正好读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书，也可能是当天“荒岛唱片”的嘉宾是位作家。）

1989年，当我的丈夫迈克尔·阿里斯，在我第一次被软禁期间来看望我时，他告诉我他的一位朋友，约翰·芬尼斯，已将我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一次我也笑了，在刹那间迈克尔很吃惊，但随即他明白了我为什么被逗乐了。诺贝尔和平奖？一个令人愉快的愿望，但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所以当我真的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我又是何感受呢？这个问题曾如此反复的摆在我面前，而此时此地肯定是最合适的场合来检验诺贝尔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和平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正如我在许多次采访中反复提到的那样，我于某个晚上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我当时并没有过分吃惊，因为在先前几周的广播节目里我被提到，说是呼声极高的候选人之一。在起草这份演讲稿时，我努力地回忆自己当年在听到那个获奖宣告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虽然无法完全确定，但我想当时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大概就是“噢，就是说他们决定把这个奖给我了”之类的东西。那对当时的我来说太不真实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时的我甚至觉得连自己的存在都不太真

实了。

在我被软禁期间，我经常觉得自身已经不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了。我的世界就是那一座禁锢我的房子；在那之外有一个人们也并非自由身的世界，但即使他们被关押在监狱，他们也能互相陪伴；当然，还有一个属于自由人的世界。每个世界就像不同的行星，在一个冷漠的宇宙里循着各自的轨道运行。诺贝尔和平奖所做的，是将从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屋再一次拉回到外面的世界，并且使我重建一种现实感。这当然并非是一瞬间发生的，当日历一页页翻过，广播里各方回应我获奖的新闻不断传来，我开始理解诺贝尔奖的意义。它让我重获现实感；它让我回到更宽广的人类社群之中。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和平奖推动世界关注缅甸民主与人权的斗争。我们将不再被遗忘。

法国人说，分离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死亡。被遗忘，也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死亡。它使我们丢失了与我们之外的人类社群之间的固有联系。我最近访问泰国时，碰到了不少从缅甸过去的移民工人和难民，他们大声呼喊道：“不要忘记我们！”他们是在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境况！不要忘记做一些你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当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我的时候，他们把那些在缅甸遭受压迫和禁锢的人们当成了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确认了人类的整全与同一。所以对我个人来说，荣获诺贝

尔和平奖意味着它使我对民主与人权的关注超越了国界。诺贝尔和平奖打开了我心中的一道门。

在缅甸，和平的概念可以解释为消除那些对和谐与安康有不利影响的因素后，所生出的幸福感。nye-in-chaan这个词直译过来就是火焰被扑灭后的怡人凉爽。而苦难和纷争的烈焰，正使整个世界都备受煎熬。在我的国家，仇恨和敌对在北部地区并没有停止（译者注：指缅北政府军和民族武装的冲突），而在西部地区，纵火与谋杀，在我离开缅甸来这里之前的几天，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译者注：应该是指六月初发生在缅甸西部孟都、东帝洞地区的骚乱）。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有关残酷暴行的新闻也接踵而来。饥饿、疾病、无家可归、失业、贫困、不公、歧视、侵犯与盲从，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负面力量存在的每个地方，它们都在腐蚀着和平的根基。在轻率地浪费物力、人力资源的每个地方，都有必要捍卫和谐与幸福。

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给我们人类的，是对有潜力的年轻人的极大损耗，是对我们地球上积极正面力量的残酷挥霍。那个年代的诗歌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第一次读到这些诗时，我正和那些年轻人年纪相仿，而他们在生命之花未全绽放之时，就要面对着凋谢的未来。我尤其记得一位参加了法国外籍军团的年轻美国士兵，他在1916年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在那之前，他写道自己将和死亡相逢，“也许在某

个阻挡我前路的路障”，“也许在某个遍布弹坑、伤痕累累的小山坡”，“也许在某座于午夜中熊熊燃烧的城镇”。青春、爱情和生命，在对一个个坐标点的无意义争夺中黯然消逝，甚至那些地点，也没有名字，更无人记得。这都是为了什么？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都还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一种更浅的程度上来说，如果我们在对待人类未来和人性的问题上态度轻率、目光短浅，我们难道就不必背负罪孽了吗？战争并非是以和平的名义制造死亡的场所。在任何苦难被忽略的地方，都会埋藏有冲突的种子，因为苦难的种子会在堕落和愤怒里生根发芽。

孤单的监禁生活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有充足的时间来反复思索我这一生里所领受的教诲和箴言的意义。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从小就知道所谓的“苦谛”，大致翻译过来就是苦难的意思。我周围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有时甚至是些年轻人，总是在遭受痛苦或者遭遇一些琐碎的烦恼时，嘴里念叨着“苦谛、苦谛啊”。但直到被监禁起来的那段时间，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去探查其中六种苦谛的本质。它们分别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在日常生活中而非宗教参悟里，我领会着这六种苦谛。如果苦难是我们存在中不可趋避的一部分，那我们就应该在现实的维度上努力缓解它。为此我反复思考着照料母婴、赡养老者、服务公共卫生、看护疾患所产生的效力。我

尤其对后两种苦谛感兴趣：爱别离与怨憎会。我想，我们的佛陀，在他一生所罹受的巨大苦难中，同这两种苦谛有过怎样的邂逅？我想起了囚徒与难民们，想起了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和苦工们，想起了大群从故土里被连根拔起、流离失所的人们，他们与家庭和朋友被迫分离，在不欢迎他们的陌生人中艰难地过活。

生活在一个社会福利和人道援助不但被高度认可，还被当成必要事务推行的社会，我们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对政治犯的囚禁引起世界各地的人们高度关注，民主和人权是与生俱来权利的信念被广泛接受的年代，我是幸运的。在被监禁的日子里，我不知多少次从我最喜欢的篇章——《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里汲取让我重新振作的力量。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译者注：此为《宣言》序言第二句）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译者注：此为《宣言》序言第三句）

如果有人问我为缅甸的人权而奋斗的原因，上面的文字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有人问我为缅甸的民主奋斗的原因，那是因为我坚信民主的建制与实践是保证人权之

所必需。

去年以降，有迹象表明，争取民主和人权的努力，在缅甸开始结出果实。这个国家确实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也向民主化开始迈出步伐。如果我呼吁大家保持谨慎的乐观，并非是因为对未来没有信心，而是不想鼓励盲目的信心。如果没有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如果没有坚守民主价值和基本人权不仅是我的国家必须，也终将在我的国家实现的信念，我们的运动不会挺过那些最黑暗的岁月。一些斗士在他们的岗位上倒下了，一些人背弃了我们，但我们专注、奉献的核心精神仍旧坚定不移。有时回想起我们度过的那些年，我很惊讶有如此多人在功亏一篑的情况下仍锲而不舍。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对自己忍耐力的清楚估计，对人民强烈渴求的深切殷忧，成为了这信心的基础。

正由于这些发生在我的国家里的改变，我能于今日站在你们面前。而这些改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你们和其他同样爱好自由与正义的人，为全世界都来关注我们的境遇做出了莫大贡献。在继续讲我的国家之前，请允许我谈谈我们的政治犯们。政治犯在缅甸依旧存在。我害怕的是，在最具声名的政治犯们被释放之后，那些不知名的人们会就此被遗忘。我站在这里，因为我曾是一名政治犯。当您看着我、听着我讲话时，请记得那个被反复提起的事实，那就是即使只有一个政治犯，也实在太多。在缅甸，那些没有重获自由，没有沐浴

公正的人，远远不止一个。请记得他们，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来促进对他们最早的、无条件的释放。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只有建立在真正团结的精神基础上。自从1948年获得独立，国家便从未能宣告达成了完全的和平。我们没能建立起消除纷争所必要的信任和理解。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的持续停火所孕育出的希望，也于短短几个月里破碎了。一个轻率的举动，就已经足够破坏长久的停火。在最近几个月，政府与民族武装力量的谈判又取得了进展。我们希望停火协议能带来建立在民众愿望和团结精神基础上的政治和解。

我的党派，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将同我一道，愿意并预备着在全国、全民族的和解中扮演任何需要扮演的角色。吴登盛总统领导的政府所实施的那些改革措施，若要持续下去，就必须和国内的所有力量保持明智的合作。他们包括军队、少数民族群体、政治党派、媒体、公民团体、工商各界，最重要的是——全体民众。我们可以说，验证改革的唯一标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升，而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国内发展和国外人道主义援助，双边的共识和投资都需要精心协调，以此来保证它们能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平衡与持续发展。我们国家的潜力是巨大的，这潜力不仅需要被培育成繁荣的经济，更需要发展成一个更加和谐与民

主，能让人民安居乐业、自由安全的社会。

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在某个地方，负面力量更加强势，我们所有人就都处在危机之中。有人会问，所有的负面力量是否都能被消除？答案很简单，当然不能。因为人类的天性中就包含了正面的和负面的两种力量。但人类也有能力去增强正面的力量，去消解或中和负面的力量。我们世界的绝对和平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但那也是我们必须不断为之努力的目标，我们专注于它，就如沙漠中的旅人以星辰为向导，最终得到拯救。纵使我们无法实现完美的和平（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个星球），但我们为实现和平而作出的共同努力，将把个体和国族都团结在信任和友爱的旗帜之下，促进整个人类社群的安全和善意。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采用了“善意”这个词。我得说这是我多年来的考虑。在逆境中我获得的慰藉里（我必须承认这样的慰藉并不多），最令我快慰，最让我珍视的，就是我在善意中所学到的东西。每次我接受到的善意，无论大小，都使我确信这样的善意对我们的世界来说还远远不够。保持善意，就是保持对他人的希望和需求作敏感而热情的回应。即使一个最轻巧的善意触碰，也能让一颗最沉重的心感到轻松。善意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而挪威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卓越的善意，它为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了一个家，为那些在自己的祖国失去安全和自由的人们提供了庇护。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难民。最

近在泰国的Maela难民营，我遇到了一群日夜奋斗，致力于改善被收容者困苦现状的人。他们谈到了自己对“捐赠疲劳”——也可以说是“同情疲劳”——的深切担忧。

“捐赠疲劳”准确地描述了资金减少的境况，而“同情疲劳”用于表述关注的减少就不太准确。前者正是后者的结果。扪心自问，我们承担得起让自己耽于“同情疲劳”所要付出的代价吗？难道满足难民们的需求，付出的代价真的比对他们的苦难熟视无睹高吗？我呼吁全世界的捐赠者尽量满足这些人寻求避难的需求，他们已经在绝望中挣扎良久。

在Maela，我同Tak省的泰方官员进行了使我获益匪浅的交流，在省里还有几个这样的难民营。他们告诉我，难民营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破坏林业法规、滥用违禁药物、私酿烈酒、难以控制的疟疾、肺结核、登革热和霍乱等疾病。这些官员的顾虑，同难民们的担忧一样，都是合情合理的。接纳难民们的东道国，在处理履行责任中所产生的问题上，同样值得并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免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和希望泯灭，每个角

落都能庇护它居民的自由，使其生活于和平的世界。有益于这一积极、健康目标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言说、每一次行动，都是对和平的贡献。而我们中的每一位，都有能力做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里我们能安全地进入梦乡，又幸福地迎接晨曦。

诺贝尔委员会在1991年10月14日如此总结颁奖陈词：“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昂山素季，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以此对这位女士的不倦努力致以崇高敬意，并借此对全世界致力于争取民主、人权和民族和解的人们表达坚定支持。”当我加入缅甸的民主运动中时，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任何奖项或荣誉的获得者。我们要争取的真正奖项是一个自由、安全、让人民的无限潜力成为可能的社会。而这奖项的荣誉，就蕴含在我们的努力之中。历史赐予了我们最好的机遇，能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奉献自身。当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这一荣誉授予我时，我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前进时就已不再孤单。为此我由衷感谢委员会、挪威的人民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民，他们的支持坚定了我追求和平的信心。谢谢你们！

(标题系编者所加。)



羔羊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文景

财新传媒
Caixin media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